

# 戈登的积累理论：分期理论的最高阶段<sup>1</sup>

[爱]特伦斯·麦克唐纳  
甘梅霞、马艳译<sup>2</sup>

**摘要** 这篇文章考察大卫·戈登社会积累结构（SSA）方法的理论渊源。文章认为戈登对增长和停滞长周期的系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长期传统的高潮，这个传统始于 20 世纪初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的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从 19 世纪后期的大萧条中复苏，这与戈登为二战后所做的分析相类似。戈登的方法是通过欧内斯特·曼德尔对晚近资本主义的研究和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研究，与这些世纪之交的分析联系在一起。戈登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早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理论。

## 一、引言

虽然大卫·戈登在很多方面对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他在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的传统中地位尤其重要。戈登关于社会积累结构的构想（与欧内斯特·曼德尔和调节学派的研究一起）是当代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

戈登关于 SSA 框架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在他的两篇种子文章（Gordon, 1978; 1980）中的理论研究以及与理查德·爱德华兹和迈克尔·赖克合作的《碎片化的工作，分化的劳工》中关于 SSA 框架的更成熟的阐述。第二个阶段包括战后美国 SSA 的具体考察，以及一个相关的美国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与塞缪尔·鲍尔斯和托马斯·韦斯科普夫合作的。本文主要涉及他早期的更具理论引领性的研究。我认为这种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传统具有独特贡献。

我认为戈登的 SSA 框架是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HBL）开创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延伸。他们有共同的基本关切，即解释资本积累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二者中，这种关切起源于他们都遇到了历史现实中一个这样的转折点。面对积累的角色变化，二者有着共同的基本战略。在这两类研究中，一个多因素、多制度解释的方法都向前推进了，并且都认为一系列制度创新开辟了新的资本主义阶段。此外，我认为，通过美国的垄断资本学派和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研究，这两个框

---

<sup>1</sup>本文译自美国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9 年第 31 卷第 4 期第 6-31 页。——译者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国积累社会结构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研究”（项目号：17AJL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2</sup>作者：特伦斯·麦克唐纳，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分校教授，悉尼大学荣誉教授。

译者：甘梅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架之间有着谱系上的联系。

## 二、社会积累结构框架

1974 年的大衰退标志着战后长期繁荣的结束。戈登观察到，二战后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束重新引发了人们对长周期理论（Gordon, 1980: 9）的兴趣。<sup>1</sup>在《分割的工作，分化的劳动者》（Gordon et al., 1982）中，他开篇便描述了当时的危机：

美国资本主义正经历一场漫长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尽管与 1930 年代的大萧条形式不同，但是与那次危机一样棘手、一样影响深远。这次危机的征状到处可见。持续的通胀、失业、短缺、危机的其他危害大量存在：工作环境的健康和安全规章，环境保护，平权法案，劳动法改革等。这些症状的背后潜藏着更多有威胁的预兆：生产率大大下降，大量破产，资本外逃等等，危机一直拒绝离场；危机持续恶化，并且政策制定者最近已经开始建议实行较大的结构性改革。随着问题看起来越来越具有根本性和周期性特征，各方提议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彻底（1）。

基于两次大萧条（19 世纪末和 1930 年代）恢复的历史经验，将 1970 年代的增长停滞看作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是不明智的。对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任何解释都必须指出它区别于商业周期中一个普通经济下行的独特特征。同时，这种解释也必须考虑到未来发生新的扩张的可能性。分析资本主义历史中可能存在长周期完全符合这个要求。

1970 年代末，戈登（Gordon, 1978; 1980）发表了两篇文章，将长周期理论和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概念联系起来。戈登的直接关切是“建立一个对此次危机的性质以及对于危机我们能做什么的更具体的理解”（Gordon, 1978: 22）。认识到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长波的系统研究必须从分析资本积累开始，戈登开始了他的研究。他指出，资本积累是“通过强制和竞争条件筛选的”（1978:27）。阶级斗争和资本间的竞争导致不稳定性，破坏盈利性，从而干扰积累。于是，在从购买原材料到生产到实现剩余价值和再投资的资本循环过程中，持续的积累依赖于确保结构性稳定。这种结构性稳定需通过制度的建立来达成。

例如，雇主必须能够通过方便可靠的方法找到雇员，这就要求有可靠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必须有稳定可依赖的方法大力驱动雇员，这就要求有“劳动管理”的制度化过程；再举第三个例子，必须有接近消费品市场的通路，这涉及到信用和交通等制度（许多其他制度中）（1978:27）。

这些制度必然是独立的，并且构成一个社会积累结构。一个社会积累结构的历史性存在代表了一个“资本主义积累阶段”（27，原文强调）。“普遍危机”由

---

<sup>1</sup>尤见福雷斯特（Forrester, 1977），罗斯托（Rostow, 1978），范·杜因（van Duijn, 1983），曼德尔（Mandel, 1975, 1980）和赖特（Wright, 1978）。

这些社会积累结构的崩溃引起。一般说来，这种崩溃由一个或多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趋势的出现引发。

最后，我们可以说长波的历史相应地是一个个依次交替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历史（27）。

长波之所以长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不协调特征和制度刚性阻止危机的快速解决，而只有在一个能够助力新的长期扩张的社会积累结构得以成功重构后，基础设施的投资才得以进行。这篇文章以这些概念在二战后长期扩张结束中的应用结尾。

总体说来，戈登在 1980 年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早期文章理论观点的更具体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戈登把他的研究描述为“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阶段’观念的概念性重构”（10）。不过，这篇文章确实在一个重要领域增强了基本理论基础。

这种增强在于重新定义了危机与社会积累结构之间的关系。戈登仍然将马克思主义危机趋势看作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显然，他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由内部冲突相互作用引致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内部冲突具体地指特定的社会积累结构本身。他将这些潜在发展称作“在社会积累结构层面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动力”（19）。他还指出导致不稳定性的传统危机趋势作用的具体路径。减缓的积累抽干了维持制度所需的资源，加剧了竞争及阶级冲突，进一步侵蚀了制度稳定性，这个路径贯穿于社会积累结构当中。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积累结构参与了危机的制造，也在长波危机的解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克的《碎片化的工作、分化的劳动者》（1982）发表不久后，SSA 方法形成了它的确定形式。这本著作将戈登的 SSA 方法运用于资本主义阶段以重新表述上述作者早期关于美国资本-劳动关系历史的分析。它在美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历史中的应用彰显了这个分析框架的通用性和分析力。并且，他将 SSA 方法的关切由最初主要集中于积累拓展至包涵制度的创新、巩固和衰败的分析当中。

在戈登等（Gordon et al., 1982）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增长和停滞交替背后的驱动力蕴藏于 SSA 的构建和崩溃中。在戈登的早期著作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趋势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回弹效应引致繁荣扩张时期的崩溃。在《碎片化的工作》中，“长期摆动更多的是社会积累结构是否能够成功促进资本主义积累的后果”（10）。戈登等（1982）年的著作仍然关注于建立一个危机的内生理论。然而，他们不仅关注内生危机理论通常潜藏的经济因素，也拓展他们的分析，将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度的矛盾、衰败和重新产生囊括在分析当中以形成他们的内生危机理论：

历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不能用制度转型的某一个方面去概况其特征……社会积累结构由一系列制度组成。如果要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那么每一项制度都是必要的，并且每一项制度在遭遇经济危机之时或之后都需要重构。所以，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制度转型都有多维度特征（38）。

### 三、SSA 方法的先例

戈登的理论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先例吗？大卫·科茨、笔者和迈克尔·赖克（Kotz, McDonough & Reich, 1994:3-4）指出了几个对 SSA 方法的发展有影响的理论传统。大致说来，他们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制度主义传统，但是他们没有追溯任何特定的长波或者阶段理论的研究。人们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理论也对这一理论产生了影响，虽然这些理论并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几年前，戈登（1980）承认曼德尔的《晚近的资本主义》（1975）“最接近这种阶段理论”（39, 44）。他提到了列宁、希法亭、巴兰和斯威齐（36, 11），但对他们的分析不屑一顾：“无论是在列宁还是最近的理论中，我们能找到严格意义上的与阶段理论近似的理论吗？”（11）。一定意义上，这篇文章中戈登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戈登 SSA 理论的知识背景必须包括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的集体贡献。

#### （一）经济复苏和马克思主义危机

20 世纪伊始，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想方设法想要解决解释积累轨迹变化的问题了。他们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早期的转变相较于任何停滞而言，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最初在 19 世纪后期的大萧条中获誉。多布（Dobb, 1947:310）将这一时期总结为“本质上是一种传统教科书式的恶性竞争和价格战导致的萧条”。他援引沃尔特·罗斯托的观点，认为资本家“开始在确定的帝国主义国外市场、关税、垄断、工会中寻求（从更少的边际利润）逃离”（Dobb, 1947:312）。吉里(Geary, 1987:2)总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1873 到 1896 年间是否真正存在大萧条是经济史学家之间争议的来源，但是，毫无疑问很多当代经济史学家，例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斯坦（最早）几乎把衰退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危机”。

尽管“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危机”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并且持续到 20 世纪的最早几年确实显示出一些恢复的迹象。这与此前长年的停滞和动荡形成强烈对比。吉里（Geary, 1987:36）总结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理论争论伊始便指出了它们的重要意义：

修正主义不是无中生有，而是 1896 年后（不仅仅在德国）发生的经济复苏以及第二帝国政治形势的结果。从 1896 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经济享受了几乎没有任何打断的增长以及低失业率，即使是在 1908-1909 年这样相对较坏的年代。1870 到 1913 年间每周真实报酬增加了 35%，1880 到 1900 年间增长显著。收入增长反映在生活标准的提高上。<sup>1</sup>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应对他们亲眼目睹的资本主义的凤凰涅槃。第二

---

<sup>1</sup>格诺伊斯（Gneuss, 1962:36-38）也讨论了经济复苏对伯恩斯坦思想的影响。

国际出现了有些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世界观。所有现象都被看作内含在事物本质中的特定规律的表现。这个观点被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指出的趋势变成类似于物理规律那样的法则。包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趋向危机趋势的观点（Colletti, 1972; Morgan, 1984:4-8; Hansen, 1985:46）。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为何从长期危机中复苏。资本主义从 19 世纪晚期的危机当中复苏，由此使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伊始突然陷入了危机。<sup>1</sup>

在一场关于这次复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意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非建设性的讨论中，可以找到这种危机的直接证据。马克思主义者渴望一个由资本主义危机恶化而导致的迅猛的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当资本主义是复苏而不是导致革命的发生，争论便开始关注经济危机在革命理论中的角色问题。<sup>2</sup>

这种“崩溃争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斯坦的追随者之间的争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资本主义危机会持续恶化，由此产生革命。而伯恩斯坦的追随者参与论争的目的是拒绝革命手段。后者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才需要革命。因为如果系统没有丢失它自身的秩序，那么阶级斗争就可以在现存的政治框架中改良，人民将能够实现“自由发展的延续”（Bernstein, 1961: 82-87）。

伯恩斯坦的观点<sup>3</sup>基于三个论据。首先，他认为不断增长的金融知识抑制投机，因此，抑制危机趋势。第二，伯恩斯坦声称随着通讯和交通的发达，企业将可以越来越精确地预先知晓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的信息，减少比例失调。伯恩斯坦的第三个论据基于对市场合理性的信任（Bernstein, 1961:82-87）。

我认识到它有能力影响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从而减少危机的危险（87）。

伯恩斯坦试图阐释经济不是充满冲突的，因此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越来越不重要。他期望展示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趋向于和谐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结束阶级对抗。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机器，随着伦理价值观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出现，国家成为造福社会的工具。

伯恩斯坦尝试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的危机，但却适得其反。伯恩斯坦试图通过从马克思主义范式外部引入概念来解决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谐观念，一个从坎特<sup>4</sup>那里借来的伦理唯心主义概念，以及一个自由的、无阶级的国家理论。这种从马克思主义外部引入的概念常常被描述为“修正主义者”的知识战略。

相反地，考茨基在这场论争中的显著特征是他对正统的坚持。<sup>5</sup>考茨基阐述

---

<sup>1</sup>阿尔都塞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本身存在问题时无法解释历史提出的挑战，便出现了危机（Althusser, 1978）。所以这种危机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一个新的并且是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范式本身的不足。这种不足将频繁地以概念上的僵化的形式存在。这两种情况在世纪之交都遇到了。

<sup>2</sup>关于修正主义分子或者崩溃论争的有用总结，可以在斯威齐（Sweezy, 1970:190-213），利西海姆（Lichtheim, 1961:272-300），霍华德和金（Howard & King, 1989:65-89），麦克莱伦（McLellan, 1979:20-49），吉里（Geary, 1987:46-59），汉森（Hansen, 1985:32-49），以及萨尔瓦多里（Salvadori, 1979:48-90）中找到。

<sup>3</sup>伯恩斯坦关于修正主义的长篇以《社会主义的若干假设与社会民主的任务》为名于 1899 年出版。它一般以《演进的社会主义》（Bernstein, 1961）为标题翻译为英文。

<sup>4</sup>关于对坎特哲学兴趣复兴作用的讨论，见利西海姆（Lichtheim, 1961: 290-300）。

<sup>5</sup>这一时期考茨基的两项主要研究是《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主义程式》（1899）和《社会革命》（1902）。虽然《社会革命》已经被翻译为英文，考茨基前期关于伯恩斯坦的研究还没有被翻译。学者们可以在古德（Goode, 1983: 15-31）的研究中找到。简明的总结可以在霍华德和金（Howard and King, 1989: 80-82）的研究中找到。从考茨基的角度所做的这个时期的文献综述包含在斯蒂森（Steenson, 1978: 116-31）的研究中。其他来源也可见脚注 4。

了小资产阶级受到的冲击，资本不断的集中和积聚（Goode, 1983:16-17; Howard and King, 1989:81）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政治和解的不可能性。

考茨基认为危机确实正在恶化。他认为从长期看，生产力必须比市场扩张得更快，虽然短期波动会持续。所以考茨基得出一个“周期性萧条”理论，在“周期性萧条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存在仍然可能……但是会变得完全不能为大众所容忍”（Sweezy, 1968: 198）。<sup>1</sup>

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回应也没有建设性。考茨基在这场论争中的基本立场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存在任何危机。在资本主义复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的背景下，考茨基拒绝承认积累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形势。由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客观条件仍然是一样的，不需要增加新概念。虽有理论创新能力<sup>2</sup>，但是考茨基和他的同僚在这场论争中满足于传统理论的重申。考茨基在修正主义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教条主义的特征。<sup>3</sup>

崩溃论争给人们留下了几个重要的未完成的理论任务。其中最紧迫的是对大萧条的结束和资本主义增长的重新出现给予一个一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这个解释一方面必须超越认为没有任何变化发生的武断观点，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把这种复苏看作是未来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和谐特征的证据，以免陷入修正主义陷阱。这种理论发展必须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冲突本质，同时对一个时期内资本主义积累的相对顺利做出解释。

## （二）金融资本，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当代马克思主义对这个理论任务的回应可以在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80）、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73）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贡献中找到。这三部著作一同形成了 20 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阶段理论的基础，我们将看到这个理论和戈登的方法有诸多相同。

### 希法亭和金融资本

20 世纪初期，希法亭 1910 年出版的《金融资本》是最早运用与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分析概念来解释资本积累复苏的尝试。它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受到几乎像是《资本论》的续篇一样（Hilferding, 1980:1）的欢迎，不仅反映了这部著作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质量，也反映了这部著作所解决的问题的日益紧迫性。<sup>4</sup>即使漫不经心地阅读这部著作都能清楚知道《金融资本》是后来布哈林和列宁著作的基础。

### 金融资本的出现

希法亭显然把他的任务看作是与马克思承担的任务密切相关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工业资本的产生和动态增长，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资本形成了对比，希法亭在《资本论》中也开始分析工业资本中出现的新型金融资本。希法亭写到，这种研究对于“科学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经济特征”

---

<sup>1</sup>关于考茨基观点的更详细讨论，见霍华德和金（Howard and King, 1987: 82-84）。

<sup>2</sup>见吉里（Geary, 1987: vii）的判断。

<sup>3</sup>见麦克唐纳和德拉戈（McDonough & Drago, 1989）。

<sup>4</sup>汤姆·巴特摩尔对《金融资本》（Hilferding, 1980: 1-17）的翻译的介绍提供了一个关于希法亭的理论和政治生涯的很好的回顾。《金融资本》中观点的有用总结可以在布鲁尔（Brewer, 1990: 88-108）、霍华德和金（Howard & King, 1989: 94-105）中找到。

(Hilferding, 1980: 21) 是非常重要的。

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起源以及它的出现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观点，决定了他这部著作的安排。希法亭从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角色的长篇讨论出发。这使得他分析信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增殖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银行开始关心“企业的长期繁荣和市场的未来状况”(95)。随着联合股份公司的出现，银行开始通过促进股票发行涉足工业资本的筹集。

联合股份公司的发明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有几个重要影响。现在，资本家可以不用承担产业资本家的功能而投资产业活动。股票交易组织使得资本池成为可能，并且为资本主义企业大规模扩张铺就道路。股票发行中促销者利润的存在产生了大量新的集中银行资本的蓄水池。由于行使控制权所需的股份远远少于百分之百，个人资本的组织范围大大扩大。不同企业间的共同所有权益产生了，这种所有权益由于紧密联系的董事而被强化。在银行持有股票的企业里，他们在公司董事会中安排了自己的人事。

这种企业相对于个人持股企业而言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它有更强的增长能力，就像它利用自由货币资本的全部供应一样。这种筹措资本的能力使得它获得更多信用。留存利润的能力给予企业价格竞争优势以及经济下行周期中的生存优势。

银行日益涉足产业生产引起商业原则的一个变化：

安全最大化的专业银行原则使银行天生厌恶竞争，倾向于通过卡特尔消除行业内的竞争，并以“稳定利润”取代竞争(179)。

本身日益集中的银行资本开始促进产业合并而不是竞争。通过减少竞争、越来越大的经济规模和技术创新、以及商业周期的越来越稳定，并购提高了利润率。集聚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来达成。与卡特尔和托拉斯打交道的必要性鼓励了更多行业的托拉斯化。这些联合体日益接管了他们自己产品的销售。

产业利润包含商业利润被资本化成了促销者的利润，变成了三位一体的战利品，这种三位一体达到了资本的最高形式，即金融资本。因为产业资本是圣父，生出了作为圣子的商业和银行资本，货币资本则是圣灵。他们三者合一，统一为金融资本(220)。

所以，金融资本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统一。在希法亭的分析中，公司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日益提高的集聚和产业集中度，以及在银行的控制下从前独立的资本活动并入金融资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资本主义朝向危机的基本趋势仍然存在，产业集中趋向于缓和资本的负面影响。希法亭观察到规模越大，企业的生存能力随着他的规模变大而提高(289)。联合股份公司可以吸引更多资本以及在好的年份里积累储备。银行和产业的经营活动多元化，尤其是银行经营活动的多元化，使风险扩散。集中银行业务也能够将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卡特尔维持价格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可以将危机的主要负担转嫁到非卡特尔化的行业上去。于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加速了集中过程。

国家和帝国主义

在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转型进行综合描之后，希法亭转向政治分析，见以下段

落：

金融资本表明了资本的统一。从前，产业、商业和银行资本的独立，现在统一在金融资本的指挥之下了，在金融资本中，产业和银行大拿被统一在紧密的人事联系中。这种联系的基础是个人资本之间自由竞争被大的垄断联合体消灭。这自然同时涉及到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这个转变的基础上，希法亭为分析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紧密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预示着戈登 SSA 方法的形成。

通过对关税的讨论，希法亭拓展了阶级和国家力量关系变化的分析。关税维持了一个高价体制，这种体制“从国内消费者中提取了巨额支付并且把它们转移到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去”（303）。关税通过减少外国竞争者的数量直接支持卡特化、通过提供增加之后随即被投资于集中化的收入间接支持卡特化。回过头来，卡特化的提高又使关税获得更多政治支持。保护关税的普遍化提升了被保护范围的大小、国家疆土的大小以及控制的殖民地大小的重要性。

为了利用通过关税提高价格的机会，卡特化的产业被迫限制为国内销售而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限制可能会提高成本。这就为促进出口销售提供了一个强烈诱因以提高产能的集中。人为的国内高价带来的额外利润可以用于补贴对国外市场的渗透。

它从作为抵御外国工业征服国内市场的一种手段，变成了国内工业征服外国市场的一种手段。（310）

同时，垄断利润增加了潜在可用做投资的资本量，因为市场垄断限制了投资机会。交通上的投资增加了向大量新领域投资的可能性。海外投资为获取原料提供了重要来源，这是国内卡特生产扩张必不可少的。

经济活动的海外扩张只有通过军事力量的威胁或使用才得以完成。在殖民地，军事力量对于平息土著人口和把他们征作自由劳动力来说必不可少。军事力量对于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争夺领土和资源的控制权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涉及到的资源投入和生产设施的开办提高了对新殖民地进行直接政治控制的需要。随着世界在主要经济体中日益被瓜分，他们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也日益加剧。由于不平衡发展，新兴工业经济体或许会发现自己没有获得殖民地财富的相应份额。领土的重新划分只有通过武力来完成，于是战争就可能发生。<sup>1</sup>

### 意识形态和劳动关系

希法亭也试图去理解与金融资本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带来的意识形态变化。新的意识形态摒弃了自由主义，强调组织而不是个体资本家的自由。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其国内外利益的强有力政权。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强调自由市场中的利益和谐，转而支持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公开追求特定的国家利益。由金融资本控制的民族主义不再维护国家自主权，而变为维护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权力。这种新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种族主义的意味：

由于外国的屈服是由武力导致的——即，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对于主导

---

<sup>1</sup>在提出这个论点时，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会从政治因素也会从经济因素中产生。



国家而言，似乎这种主导是由于一些特殊的自然质素，简而言之，就是它的种族特征导致的。所以，披着自然科学、金融资本权力贪欲正当理由外衣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出现，这种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自然现象的特性和必要性。一种寡头主导思想便取代了民主平等思想（335）。

希法亭还考察了金融资本时代不同阶级关系的变化。支持关税和强势政府、对抗劳工阶级使得资本和大地主日益勾连起来。小企业越来越从属于大资本，也同样对抗劳动者。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了，这个中间阶层由商业和工业中的职业经理人和技术雇员组成。这个快速增长的阶层政治上还与大资本和帝国主义战略结盟。

在劳动关系领域，工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在雇主组织中日益团结的资本家阶级。希法亭观察到“显然，雇主组织的出现涉及资本和劳动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356）。从前，工会可以让在个别雇主那里工作的工人罢工，而工会中其他大多数成员仍然在其他企业工作。面对商业上的损失，雇主被分化，常常被迫投降。随着产业集中的发生，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大企业有更多资源应对有组织的罢工。雇主现在受到协会的支持，协会可以通过找到替代的工人暂时地交付订货、补偿损失，并且阻止罢工。这些协会可以控制冲突的时间，并锁定工会中不罢工的成员。垄断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价抵消工资上涨，补偿罢工期间的损失。

希法亭通过深入考察经济层面不同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开始他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发现金融资本与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联盟的特征和劳动合同冲突中阶级力量的平衡有关。资本利益的变化导致政治层面的变化。资本和强势政府联系越来越密切，当垄断企业在国外实行帝国主义野心勃勃的政策时，强势政府可以保护它在国内的垄断地位。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是有理由的，因为放弃了自由主义，而采用了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以，经济变化也一样，金融资本的主导带来了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型。这种多层次分析，包括对政治和社会制度作用的分析，为戈登后来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多因素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 布哈林和世界经济

据布哈林的传记作家说，《金融资本》是1915年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73）的“起点和极其重要的启发”（Cohen, 1908: 25）。<sup>1</sup>布哈林和希法亭的主要区别在于布哈林掉转了希法亭的论述顺序。希法亭从金融资本开始叙述，然后到积聚，到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布哈林从世界经济开始：

所以，研究帝国主义、它的经济特征以及它的未来的问题，就简化为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它的内部结构的可能变化的问题（Bukharin, 1973: 18-19）。

然后，他开始描绘世界经济、国家政策、阶级关系、积聚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关联。<sup>2</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哈林当然理应从信用关系发展的抽象层面开

---

<sup>1</sup>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布哈林著作的标题在翻译为英文时被翻译为《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因为标题的顺序与后续的观点有一点关系，我按原顺序给出这个标题。

<sup>2</sup>对布哈林在这部著作中所作贡献性质的其他评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强调了这部著作的不同方面。科亨的文献（Cohen, 1980: 25-36）包含了关于《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有用讨论。其他有用的论述可以在科尔南（Kiernan, 1974: 27-36），巴罗内（Barone, 1985: 35-45），布鲁内（Brewer, 1990: 109-16），以及霍华德和金（Howard & King, 1989: 245-48）中找到。

始。这种论述顺序的逆转至少相当于强调重点的不同，除此之外，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原因的因果分析比希法亭的分析多。然而，这容易过度估计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希法亭在通篇的分析中非常小心地保持不同制度相互影响的特征，这些制度将金融资本描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大体上，在布哈林的论述中，这些关联的性质并没有明显改变。布哈林对希法亭阐述顺序的修改主要强调了构成他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的相互关联性。

从阶段理论的角度看，布哈林的著作有助于重申、进一步记录和更新希法亭的分析。布哈林在一个关键领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理论的前进。布哈林强调这一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整体性和历史局限性。他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确定的历史实体”，认为金融资本是“一个历史有限的时代”。(114-115)。此外，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其他特征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显现出来：

……当我们把帝国主义说成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时，就能理解它的征服特性；然而，同时，我们指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被这种征服政策再生产出来。此外，这个定义也包括一系列其他历史趋势和特征。实际上，当我们谈到金融资本时，我们指的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有机体，因此，指的是一定范围和强度的世界关系；一句话，我们暗示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存在；同样，我们也暗示着某种生产关系的状态、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阶级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的某种未来，等等。甚至斗争的形式和手段、国家权力的组织、军事技术等，都或多或少地被看作是一个确定的实体…… (114-15)。

### 列宁和垄断阶段

只有在甄别希法亭和布哈林各自的贡献后才能评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特殊贡献(1968)。<sup>1</sup>列宁的著作广泛地借鉴了前两部作品，也是这三者之中篇幅最短的。<sup>2</sup>它并不是计划要写成一部独立的大部头理论著作，而是就像列宁所说，是“一个受欢迎的提纲”。<sup>3</sup>此外，列宁故意限制了小册子的范围：

……我应该试图去简要地并尽可能简单地说明帝国主义主要经济特征之间的关联和关系。我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非经济方面，尽管他们值得去讨论(176, 原文中强调)。

在后来的一个序言中，列宁解释了省略帝国主义的政治方面是为了绕开沙皇审查制度(169)。列宁考察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希法亭和布哈林讨论的那些特征的

---

<sup>1</sup>总体而言，关于列宁、尤其是《帝国主义》不存在材料的不足。其中一个最好的论述见哈丁(Harding, 1980: 1-70)。

<sup>2</sup>从这个角度看，《帝国主义》的前一个语境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争论。克鲁帕斯卡亚(没有日期)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普斯科夫，波特列索夫和L.N. 拉琴科和他的孩子们后来也生活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笑着讲述到拉琴科的小女儿真尤卡和莉达过去如何逗他和波特列索夫。他们把手背在背后，一本正经地并肩踱步进进出出房间，其中一人说“伯恩斯坦”，而另一人重复着“考茨基”。

<sup>3</sup>虽然列宁在《帝国主义》中只是简单地提到布哈林的作品，但他在1915年为这本书写的赞美序言却清楚地表明，他曾仔细阅读过这本手稿，并对其表示钦佩。帝国主义中很少提到它，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在写帝国主义时，布哈林的书由于沙皇的审查制度而没有出版。事实上，布哈林思想传播的失败似乎促使列宁就这个问题写了自己的一本书。列宁将他的书作为对布哈林的总结和评论的一部分，可能谴责了在俄罗斯帝国主义同样黑暗。

子集。总体而言，他对这些特征之间关系的讨论遵循希法亭最初提出的路线。

尽管如此，从推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理论的角度看，《帝国主义》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第一个是将帝国主义认定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阶段一词被运用于副标题中，并且频繁贯穿于整部著作中。这本身很重要，但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术语的问题。阶段概念的使用与希法亭资本主义阶段的概念和布哈林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论述非常相似。然而，列宁试图更明确地确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与其前身之间的界限，从而使他对这个新名词的使用具有实质意义。

列宁在处理这项任务时非常谨慎，他曾争辩说“声称帝国主义在特定年份或者十年中确立起来了，是荒谬的”（233）。但是，贯穿于《帝国主义》这一著作中，列宁密切关注辨认阶段转变的时间。比如，他认为：

对于欧洲而言，新资本主义完全取代旧的资本主义的时间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即是 20 世纪伊始（180，原文强调）。

列宁的论述中另外一个较大区别是垄断市场结构发展的角色。我已经讨论过希法亭如何以金融资本开始他的分析，而布哈林以世界经济作为他的起点，分析的实质上是同一组制度。列宁采用了另外一个起点，强调垄断资本在帝国主义中的角色。实际上，列宁在《帝国主义》中最常引用的一段话中，把这二者等同起来：

如果要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可能最简要的定义，我们应该不得不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232）。

列宁尤其关注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体制对增长率的影响。布哈林，尤其是希法亭，在强调金融资本的各个方面对利润率条件的积极影响时隐约提到了这一点。在强调资本主义增长的不平衡特征时，列宁指出“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相比从前增长更迅速……”（259）。

在回应积累模式的变化时，希法亭和布哈林提出了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它的发展看作是一个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领域中资本主义连锁变化的广泛集合。列宁把这种理论命名为阶段理论，并认为向垄断资本的转变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变化。最后，列宁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同新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没有淡化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冲突性质和资本主义随之产生的危机倾向。所有这些阶段理论的特征都将体现在戈登对社会积累结构的研究中。

#### 四、家谱关系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戈登否认列宁和希法亭的影响，更不用说布哈林了？这是重新发现先前丢失的概念方法的案例吗？我认为不是。HBL 的资本主义阶段理论通过两条路径影响戈登的研究。一个是通过垄断资本学派，这个观点在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克关于劳动市场分割的初期研究中尤其显而易见。另一条是通过欧内斯特·曼德尔《晚近资本主义》的公认影响。

欧内斯特·曼德尔

曼德尔对 20 世纪经济的早期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HBL 的分析。《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70) 的第 12、13、14 章分别命名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衰落的新纪元”。这些章节再造和更新了 HBL 关于金融资本时代的大量阐释。曼德尔在强调垄断自我融资的重要性,以及用“垄断资本主义”一词取代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方面与斯威齐相提并论。<sup>1</sup>曼德尔在其不朽的《晚近资本主义》中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这些长波形成了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基础:

长波……不只是表示给定时间跨度的统计平均值……它们代表历史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历史的片段,这些片段有着明显可分辨的特征。因为同样的原因,它们的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长波的解释,以其特有的内在经济因素的交织、外在的“环境”变化以及社会政治发展(即,阶级力量总体平衡和资本间力量关系的周期性变化,重大阶级斗争和战争的结果)的中介作用,使长波的历史现实具有一个融合的“整体性”特征(Mandel, 1980:97)。

曼德尔指出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三个连续阶段:竞争资本主义,传统帝国主义,和晚近资本主义。正如称谓的选择所表明的那样,列宁的分析为曼德尔的第二阶段,“被列宁描述为”传统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提供了基础(82)。在英文版本的引言里,曼德尔将他对资本主义晚期的分析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讨论之间的联系,直接类比为列宁的分析和马克思的分析之间的关系:

……“晚近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绝不是暗示帝国主义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使得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得出的结论过时了。正像列宁只能在《资本论》基础上开展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一样,像马克思发现确认主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过程的一般规律一样,今天,我们只能试图在列宁《帝国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关于晚近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仅仅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时代的进一步分析。言下之意,列宁列举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对晚近资本主义而言仍然完全有效。(9)

像 HBL 和戈登一样,曼德尔强调其他经济要素的“关键作用”(Mandel, 1980:20)。开启一个长波上升(即,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新时期)的利润率增长可以这样理解:

只有在特定环境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具体形式……都发挥作用。并且,这些包括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征战、资本主义运转领域的扩张和收缩、资本间的竞争、阶级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运行的整个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剧烈变化反过来又引起,可以说,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发生根本性的剧变……(21-22)。

曼德尔结合传统帝国主义时代,讨论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化;资本出口,殖

---

<sup>1</sup>这些章节还包含了曼德尔对技术革命在推动积累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最终阻碍了进一步的扩张。这些重点也成为曼德尔(Mandel, 1978)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曼德尔的方法与戈登之前的两篇文章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民主义，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竞争，以及不平等交换；国家的日益重要性；福利政策的引入；以及技术变化。这种多因素讨论也被应用于分析晚近资本主义。在这种结合中，曼德尔讨论技术变化、劳工组织弱化、长期集体谈判、劳动过程的车间控制、跨国公司、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国际货币体系、马歇尔计划、国家通过军事合同和其他方式保障利润、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营销增长和消费者操纵、消费信用扩张、公共通信以及技术统领一切的意识形态的变化。

### 垄断资本学派

HBL 资本主义阶段理论影响戈登理论的第二条路径是保罗·斯威齐创立的垄断资本学派。这个学派或许对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克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分割的研究影响尤其重要。这种影响在《分割的工作》中得到承认（1982:22），并且在他们最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联合研究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见下文）。

HBL 的垄断资本理论作为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动态分析，构成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1968）研究的重要基础。斯威齐构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策略，本质上是将 HBL 的论述等同于《资本论》第四卷。《资本主义发展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详细解释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以及积累过程。第四部分命名为“帝国主义”，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的解释。

斯威齐的论述与希法亭和列宁的主要不同在于，斯威齐认为“银行资本的主导地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大致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相吻合。”（268）。斯威齐指出，列宁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处理更加平衡，并得出结论：

因此，列宁的理论当然不能接受针对希法亭的批评。尽管如此，“金融资本”一词是否能从希法亭赋予它的银行家主导地位的内涵中剥离出来仍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干脆放弃它，代之以“垄断资本”一词，它清楚地表明了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中什么是本质的，并且不太可能像后者那样误导粗心的读者。（269）。

所以，希法亭和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是以“垄断资本主义”进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中的。

斯威齐与保罗·巴兰共同完成的另一项关于《垄断资本》的主要工作，旨在研究垄断积累过程的动力。他们主要通过论证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消费不足危机的强烈趋势来进行这项工作。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令人熟知，无需在此赘述。巴兰的影响很大。相较于希法亭，这项研究受益于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sup>1</sup>的研究更多。尽管《垄断资本》包含了对美国社会的广泛分析，但希法亭对垄断资本与其他社会形态层次之间关系的严密分析却部分失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用于分析消费不足的篇幅<sup>2</sup>，以及对垄断资本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的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巴兰和斯威齐将这个期间从内战结束划定到现在。所以，除了市场结构之外，垄断和特定制度的所有联系就倾向于被削弱了。戈登和他的合作者对这项研究提

---

<sup>1</sup>尤其见卡莱茨基（Kalecky, 1954）和斯坦德尔（Steindler, 1952）。

<sup>2</sup>巴兰和斯威齐在引言中写道：“我们特别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几乎完全忽视了一个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的主题：劳动过程”（8-9）。

出了批评，以将他们的观点区别于垄断资本学派。然而，在强调与巴兰和斯威齐的不同同时，戈登模糊了他的研究与斯威齐早期基础性研究的密切关系，以及和后续垄断资本传统内的发展的密切关系。

继《垄断资本》之后，垄断资本学派的两部主要著作是哈里·马格多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和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这两部著作高度依赖列宁的《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分析基础。他们也将垄断阶段的开始时间恢复为列宁提出的世纪之交左右。重要的是，这两项研究还拓展了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范围。马格多夫关注“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布雷弗曼试图弥补研究斯威齐和马格多夫都留意到了的垄断资本和劳动过程关系的空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分析了垄断资本和车间控制、劳动关系、技术、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和工人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些深入研究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恢复了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多层次分析，这种分析方法由希法亭开创，由布哈林和列宁推向前进。

在布雷弗曼写作的同时期，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尝试解决劳动和垄断资本关系的问题。1973年，赖克、戈登和爱德华兹（Reich, Gordon & Edwards, 1973）发表了一篇将劳动市场分割与垄断资本的出现联系起来的文章。他们指出，垄断资本的出现导致了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经济的分割。结果，“与工业结构的二元化一起，出现了工作环境、工资和流动模式相应的二元化”（363）。此外：

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设计了深思熟虑的战略，以解决劳动力日益无产阶级化与企业集中力量的增长和巩固之间的矛盾。新战略的中心要旨是打破无产阶级化和工人向城市集中所产生的日益统一的工人利益。正如这些大企业经营中几个方面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行为旨在将劳动力分化为不同的碎片，从而使工人的实际经验不同，破坏他们共同反对资本家的基础。（361）

《分割的工作，分化的劳动者》本质上是戈登的 SSA 研究与三位作者早前对劳动市场分割的历史起源的兴趣的融合，它尝试追踪 HBL 通过曼德尔对 SSA 产生的影响，以及通过斯威齐对劳动分割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HBL 理论是构建 SSA 框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背景的一部分。

## 五、戈登的贡献的性质

在将垄断资本分析与长波视角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很明显，在世纪之交，垄断资本的出现与 19 世纪末长波低谷的结束以及随后长波扩张的开始相吻合。采用长波观点提出的新问题是，二战后的扩张是否与一系列类似的多纬度的制度变革有关。巴兰、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将战后扩张看作是垄断资本长期动力的暂时中断。这一中断是由一系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束有关的事态发展所造成的。

戈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所不同。他通过识别一系列战后初期建立的解释资本主义新的扩张的制度来解释战后长期繁荣。这些制度包括跨国企业结构、与重要的行业工会主义相关的二元劳动市场、盟国国际经济和军事霸权、宽松的信贷、保守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和工人的官僚控制。

通过这种方式，戈登建立了清楚说明对后续经济扩张有重要影响的战后制度集合的可能性，这种方式与 HBL 通过分析制度集合解释世纪之交扩张的方式相似。所以，毫无疑问地，HBL 垄断资本的多制度分析被戈登用作解释战后扩张的一个模型。

这类解释提出的理论问题是，这种制度集合是否可以被概括为更全面的资本主义阶段理论的基础。戈登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构成垄断资本和战后社会秩序的制度都是社会积累结构的例子。每一个时期的新 SSA 的构建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提供了基础。

## 六、结论

我认为，由大卫·戈登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社会积累结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这一理论传统在世纪之交由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提出。这一传统认为，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复苏是由于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盈利的制度条件进行了全面的重组。这种新的制度结构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包括经济制度，构成了开创资本主义一个新阶段的基础。

戈登的主要贡献<sup>1</sup>在于识别出二战后发生的类似历史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战后资本主义阶段理论。由于戈登的介入，HBL 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理论转变为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理论。从而，这一理论能够被用于理解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漫长历史的一般性。必须强调的是，它将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积累理论的中心。

## 参考文献

[1] Althusser, Louis. 1978. The Crisis of Marxism. Theoretical Review 7 (Sept.-Oct.).

[2] Barone, Charles A. 1985. Marxism Thought on Imperialism. Armonk, N. Y.: M. E. Sharpe.

[3] Bernstein, Edouard. 1961 (1899).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N. Y.: Schocken.

[4]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5] Brewer, Anthony. 199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London: Routledge.

[6] Bukharin, Nikolai. 1973 (1915).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New York,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7] Cohen, Stephen F. 1980 (1971).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p>1</sup>戈登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与曼德尔并驾齐驱。见上文。

- [8] Colletti, Lucio. 1972. *From Rousseau to Lenin*.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9] Dobb, Maurice. 1947.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0] Forrester, Jay. 1977. *Growth Cycles*. *The Economist*, 125.
- [11] Geary, Dick. 1987. *Karl Kautsk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2] Gneuss, Christian. 1962. *The Precursor: Eduard Bernstein*. In *Revisionism*. Leopold Labedz (e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13] Goode, Patrick. 1983.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Macmillan.
- [14] Gordon, David M. 1978. *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 In *Capitalism in Crisis*.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ed.) New York, N.Y.: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80. *Stages of Accumulation and Long Economic Cycles*. In *Processes of the World System*. Terence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15] Gordon, David M., Richard C.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6] Hansen, F.R. 1985. *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Idea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7] Harding, Neil. 1981.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2*.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18] Hilferding, Rudolf. 1980 (1910).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 Howard, M.C., and J.E. King. 1989.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 1883-192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 Kautsky, Karl. 1899.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Eine Antikritik*. Stuttgart: Dietz. 1916 (1902). *The Social Revolution*. Chicago, Ill.: Charles H. Kerr.
- [21] Kalecki, Michael. 1954.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22] Kiernan, V.G. 1974.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 [23] Kotz, David M., Terrence McDonough, and Michael Reich (eds.). 1994.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4] Krupskaya, Nadezhda. No Date. *Memories of Lenin*. London: Martin Lawrence.
- [25] Lenin, V.I. 1968 (1917).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69-262.
- [26] Lichtheim, George. 1961.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27] Magdoff, Harry. 1969.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28] Mandel, Ernest. 1970. *Marxism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1975).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0.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McDonough, Terrence, and Robert Drago. 1989. Cris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First Crisis of Marxism: A Theoretical Note on the Bernstein-Kautsky Debat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1(3): 27-32.

[30] McLellan, David. 1979. *Marx after Marx*. London: Macmillan.

[31] Morgan, D.W. 1984. The "Orthodox" Marxists: First Generation of a Tradition. In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R.J. Bullen et al. (eds.). Pp. 4-15. London: Croom and Helm.

[32] Reich, Michael, David M. Gordon, and Richard C. Edwards. 1973. A Theory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May): 359-65.

[33] Rostow, Walter. 1978. *The World Econom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4] Salvadori, Massimo. 1979. *Kautsk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New Left Books.

[35] Steenson, G. 1978. *Karl Kautsky 1854-1938: 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36] Steindl, Josef. 1952.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37] Sweezy, Paul M. 1968 (1942).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38] Van Duijn, J.J. 1983. *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39] Wright, Erik Olin.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